文学新观察

先锋文学 回归传统书写

杨镝霏

近日，作家苏童接过北师大校长董奇、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的聘书，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四位驻校作家。在苏童之前，北师大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三位作家，以及欧阳江河、西川两位诗人驻校。入校仪式后，著名作家格非、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等著名作家学者，就“先锋精神与传统书写”的主题，对苏童30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研讨。

苏童3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在先锋文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读者与市场的选择下，先锋文学实验似乎已经悄然落幕。现实主义的重新复苏，使得先锋文学与传统叙事在内部磨合中进行着相互融通。

先锋文学的自我局限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锋派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革命性的颠覆，他们从宏大叙事的传统中破茧而出，掀起了一场形式主义革命。就像苏童本人在研讨会上回忆80年代时提到的：“（1980-1984）那4年是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我们的青春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学时代。我们同年龄的人的记忆都是雷同的，我个人的遭遇、经验跟很多人都是雷同的。”

在这样的“雷同”之下，先锋派作家们主张回归文学本身，用“怎么写”来推翻“写什么”，颠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原则与文本规范。正因如此，先锋文学与绝大部分读者的接受心理产生了隔阂，读者无法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先锋派文学代表作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格非的《褐色鸟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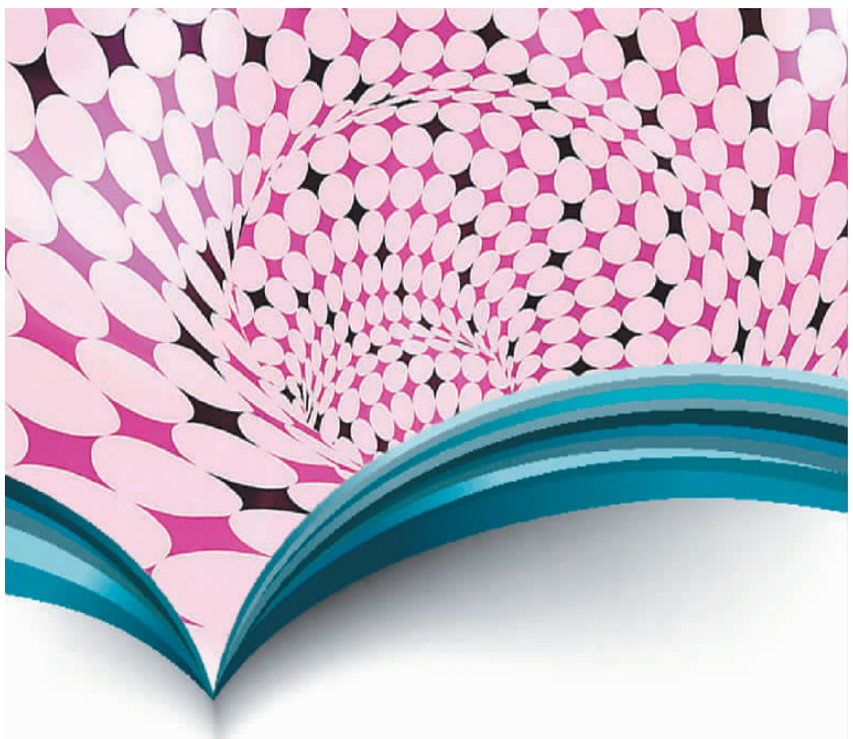
80年代后半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商品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就文学自身而言，已经难以运用权威话语体系维持统一的文学规范，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所言：“纯文学既然被现实推到社会的边缘地带，那么它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和自身的既定传统对话，回到文学自身，用语言、叙述与更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思想作为写作的根基。”

先锋与流行结合，重新获得读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先锋作家笔下的文本逐渐摆脱了形式的追求，更为尊重个人体验，重塑生动的人物形象，追寻价值意义。他们恢复对人的基本关怀，思考人们的精神困境。

对先锋作家们做出的转变，诗人欧阳江河认为苏童对此贡献极大，他认为，正是苏童写作中的双重性，带来了先锋文学的新面目。“有时候先锋写作是要以牺牲日常性、流行性和大家普通的理解为代价，就是要很尖锐，就是要拒绝流行、拒绝愉悦，但是苏童兼顾了这两点。”

在《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看来，让原本在空中飘着的先锋文学落地、重新获得读者是苏童对先锋文学转型带来的意义，而他的方式正是“将传统带入先锋”：《妻妾成群》里颂莲进陈家大院，呼应的是林黛玉进大观园的情境；而苏童对人物的命名，也与《红楼梦》一样暗合了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国的几大古典小说是由话本发展过来的，首先有广泛读者基础，后来由文人进行加工，变成了名著。而《红楼梦》一开始不是通过大众传媒，而是文人之间的相互传抄，渐渐被大众知道，后来成为了经典之作。苏童的写作方式有点像《红楼梦》，慢慢书写，然后被大众认可。”



让落地成为先锋文学新常态

如今重新审视上世纪80年代这场带有实验性、模仿性的文学思潮，可以发现即便在当时，苏童也坚持了源自自己经验的、独立的写作风格。“南方作家确实有上善若水，落地成形的特点。读到苏童的小说有一种鲜明的感觉，就是非常自然。他是天生的小说家。”陈晓明说。

与马原等作家追求叙事技巧的先锋性相比，苏童更擅长于把故事讲得更有古典韵味和改编可能性。苏童的《妻妾成群》就已经带有向传统回归的意向。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陈晓明表示，那时候他非常惊异苏童能在1989年写出如此具有传统色彩的作品，但在形式革命的背后，回归传统是一种必然。“《妻妾成群》非常鲜明地重写了中国传统的故事，完全颠覆了《家》《春》《秋》的模式。思考先锋派，其实也正是思考中国文学如何在传统历史上始终地挑战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表示，总结先锋派的写作，不一定看形式的表现。“几代作家内心深处恐怕都有一种出走情结，一种从流行色突围的这样一种冲动，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苏童自己还是找到了独特的属于自己智慧的表达方式。”

王干作为当年出版苏童作品的编辑，认为正是苏童的落地让先锋文学获得更多关注。余华小说的畅销，也是在苏童作品的畅销之后完成的。“苏童的《妻妾成群》之后，先锋文学开始被更多的出版社和读者关注，也带动了整个先锋文学向传统书写的转型。”

关注现实人生

格非、苏童、余华等人，都是先锋作家群中转型成功的典范，他们弱化对文本形式的实验，融合现实主义元素，关注人的生存现实。格非和北村在选材上更加注重描写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写出当代人在名利、爱情、道德、欲望之间的拼搏与挣扎，而余华和苏童则多以历史题材为焦点。

其中，苏童让作品回归故事性，通过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展现人的命运的叵测难料，是先锋文学向传统回归的一个成功尝试。孙郁用“暗功夫”来描述作家文本背后的厚重程度。“汪曾祺先生就是有暗功夫的，表面上用的是大白话，背后都是文言文在支撑。汪曾祺其实是80年代很先锋的一个作家。”

孙郁表示，后来他在格非、余华和苏童的写作中发现，这些作家也一直在寻找暗功夫。“苏童在气脉上是从《霜叶红于二月花》里面过来的。而且茅盾自己被抑制住的东西，被他召唤出来了。到了《河岸》，苏童完全超越《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境界，那种梦幻，那些打动人心灵的意象不断从里面飞出来，这就是他暗功夫的一种表现。”“我真的觉得中国80年代这一代先锋写作的这些人，正在回归传统并开始接地气。”

北师大资深教授童庆炳也对这样的功夫表示赞许：“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够凭着自己童年的一些观察、体会，把童年的生活延伸、扩大，加以变形，然后写出像苏童笔下这样的女性的世界。”回忆当年的学生，童庆炳表示苏童对女性的解构视角超乎他的想象。

同是老乡的作家格非，也格外欣赏苏童一向适可而止乃至未竟即止的气质，“苏童的作品永远不会过头，他非常随意，当然这随意背后自然是有功夫的。从缺点上说，这种方式可能没法达到完美，火候上会欠一点，因为他大大咧咧，当停就停，不刻意、不做作，哪怕稍欠一点，也不要熟过头。”

事实上，单纯依靠“先锋”二字已经远远无法涵盖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的全部书写。莫言在谈起格非与苏童时说：“这是两位著名先锋派的作家，实际上他们身上有很多非常入世的东西，‘先锋’很难概括他们。”

□散文

三　嫂

李富胜

三嫂离开我们有7年了。7年来，深深的思念时常牵动着我的浓浓情愫，记忆的荧屏上晃动着她生前忙忙碌碌奔波劳作的身影和仁慈和善的音容笑貌。

在我记忆里，三嫂寡言少语，匆匆忙忙做事，忙忙碌碌奔波。三嫂和母亲相处和谐默契。每当母亲在灶上忙活做饭，三嫂准是在灶下，拉着那个沉重的风匣烧火。家里家外，田里院里，春种秋收，三嫂和母亲总是形影不离。三嫂和母亲三十多年相伴，从未红过脸，没闹过一次别扭。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三嫂有个做裁缝好手艺，被镇被服厂招工当了缝纫工，每月收入29元钱。到了开支的日子，她总是分文不留，恭恭敬敬地交给母亲，母亲有时会暗示三嫂留点体己钱，她总是摇摇头微微一笑。

上个世纪70年代供给制时期，父亲厂里分到一张缝纫机票，父亲东借西凑，才把这台缝纫机买回来。那个年代家里有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买回来并没有人用，直到三嫂来到我家后，这台封尘已久的缝纫机才派上用场。三嫂的裁缝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街坊四邻都慕名找到家求三嫂缝衣制裤。尤其是逢年过节，缝纫活就更多，三嫂总是来者不拒，免费为乡亲们服务。为了能让东邻西舍的乡亲过年穿上新衣服，三嫂只能白天上班，晚上在那台缝纫机上手脚并用地干到深夜。乡亲们送些蔬菜瓜果等土特产以表谢意，都夸三嫂是个心灵手巧贤惠能干的好媳妇。

街坊四邻再加上我们一大家子兄弟妯娌、侄儿侄女二十多口子缝缝补补的活儿，全由三嫂承担着。白天忙，晚上忙，几乎机器人似地重复动作，三嫂总是默默操劳，毫无怨言。分家时，缝纫机大家一致同意给了三嫂，从此这台老式“上海”牌缝纫机陪伴了她一生。

三嫂对我厚爱有加，总是亲昵地称我“老胜”。在那个年代，市面上成品衣服很少，就算有，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也只能望“衣”兴叹。我的穿着衣物，几乎全部都是三嫂亲手缝制的。记得我头一次到大连去拜见岳父母，翻箱倒柜也未找到件像样的衣服。那天三嫂把我叫到跟前，拿软尺给我量尺寸。一个星期后，当我回家时，三嫂笑着说：“老胜，穿着新衣服去见丈母娘吧。”说着把一套的确凉面料深蓝色的新衣服送到我面前。我惊喜万分。事后母亲告诉我，三嫂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才使我有了这套有生以来记忆最深刻的新衣服，“老嫂比母”啊。结婚时，我和爱人从衣服到裤子，从床上盖的到身上穿的，几乎全由三嫂挑灯熬夜辛辛苦苦亲手制作。三嫂还专门为我俩制作鞋垫，红布底，金黄的丝线绣着两只鸳鸯和“比翼双飞百年好合”8个字。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甜蜜温暖。

1985年6月，我电大毕业了。毕业证上需要一张单人半身照片，同学们约定要着洋装——西服。那时穿西服的人极少，市面成品西服也少见且价格高。我和妻子到商店里买了一块藏蓝色的半毛料，回家找到三嫂。三嫂犹豫了一会儿说：“西服我还从来没做过，不过别着急，我试试看。老胜啊，你是咱家第一个大学生，放心吧，这身西服一定让你满意，展展扬扬地照个好相片。”三嫂给我量了又量，生怕出一点差错，然后她找到制作西服有关的资料，认真研究，反复推敲。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一针一线加班加点赶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西服，那张穿着洋装的照片永远定格在红彤彤的大学毕业证上。

2005年6月，三嫂患重病住院，需要大手术。我和妻子商量后为三嫂支付了一万元的手术费。2007年4月，三嫂病情严重，她嘱咐三哥说：“我死了不要告诉老胜，他在国外出差不要分他的心，捧公家的饭碗不容易，以后老胜能在我坟前放个花圈我就知足。”她又叮嘱儿子女儿：“我做手术你叔和婶给了一万块钱，以后你俩给还上，他们也没钱，你弟还上大学呢。”三嫂去世时，我正在韩国做文化访问，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为此我心里留下深深的遗憾。三嫂临终那简单质朴的话语，深深地打动着我。一个平凡的世界，一个简单的人生，却有着一个不平凡不简单的心灵世界，那样地纯真、圣洁、高贵、美丽。

被文字唤醒的非洲之角

张抗抗

近读周洪立先生所著《援外手记》，感慨良多。

《非洲之角的日日夜夜——援外手记》记录了周洪立当年在非洲之角的种种亲历往事，“援外”工作在他笔下还原为可亲可近可信可感的日常形态。

30年前，洪立兄在索马里偏僻乡村及中国使馆封闭的生活中，为排遣寂寞有心无意写下的日记和笔记，成为该书最可靠的资料依据。30年后，全球一体的“互联网”时代，为重新解读当年“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提供了新的空间。洪立兄终于下决心将泛黄的纸页一篇篇梳理整合成文，陆续发表于他本人的博客，果然迅速激发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当时本国经济仍面临极大困难、民众医疗水平普遍低下的状态下，慷慨派出医疗队，远赴非洲实施无偿的国际主义援助，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目前，仍有42个中国医疗队分布在40个国家，总人数达1100人。

“文革”期间毕业于大学英语专业的“老五届”周洪立先生，曾在茫然无路的青年时代，有幸作为医疗队的英语译员，在索马里北部工作了将近3年。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无论东亚这个外强内弱的“中央之国”，还是地处黑非洲一隅的索马里，都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拐角。那也许已是中国医疗队在非洲之角的尾声，因而暗含了某种悲壮的告别意味。

30年过去，那段历史渐行渐远，曾经家喻户晓的“援外”热词，对于现今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它曾经的光环。当年人们对“援外”一词的浓厚兴趣，或许来自人们对自身的探究——父辈的中国，和外部世界曾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些惺惺相惜的贫困远邻之间，究竟被怎样的一条通道牵连？

今人不再相信史书或教科书，但相信身边人的真实故事。

《援外手记》文字朴素，叙事平实，一字一句老老实实讲述遥远的故事。文中并无夸饰惊人之语，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亲切感，令人如闻非洲的鼓乐之声香蕉之醉，亲见黑肤白齿明眸的索马里人之美，重温中国医疗队简陋的药箱与神奇的银针……但凡优秀的纪实性作品，大多取决于内容的信息质量和真实程度。

《援外手记》取材不趋时、不跟风，另凿泉眼、别开生面——回望1978的非洲，身后是国门初开的中国，眼前是闭塞而又淳朴的索马里。中国医疗队奔波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理念夹缝之间，那些被人熟知或“鲜为人知”的困境与悖论，为今天的读者创造了“陌生化”的效果。纪实作品的优劣不在于信息量的密集度，而在于信息质的有效性。信息有效方能保证作品的可读性、新鲜感与吸引力。

《援外手记》的真实性，则表现于语言、细节、个人情感与认知的真实性。在书中，作者的笔穿越了时光隧道，将自己退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当年的国内外历史背景、真实描述索马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忠实记录中国医生们的辛勤工作及思乡之情，包括异国他乡的批判会……看似信手拈来的小故事，细细品味，也都别有意趣。

人的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都已被时光磨损或淡忘；而那些被珍存至今的故事，必然是生命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洪立兄曾经勇敢地抛掷在非洲之角的青春时光，逾至花甲之年，终被他一笔笔唤回。在那些娓娓道来、亲切平和的字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在异国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的成长——在救治他人的过程中，接受爱的启蒙；学习助人、爱人、阅人；领悟、珍惜和尊重生命，并在给予和付出中获得快乐，逐渐走向成熟。褪去70年代“援外”的国家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了跨越国界、阶级、民族的人性之光和大美大爱。

或许，这正是打动并感染了今天的年轻读者之处。

好书既没有句号也没有答案，只有潜伏的问号。愿读者在问号中成长，就像很多年前，那位睁大好奇的眼睛，行走在索马里海岸的中国青年。

在唤醒非洲之角记忆的同时，我们还能唤醒别的什么？

首届全国微型小说高峰论坛举行

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以“微型小说发展展望：创造力，优化、普及与提高”为主题的“首届全国微型小说高峰论坛”日前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着眼于微型小说发展现状，围绕微小说的现状和趋势，重点探讨微小说如何实现“大众化”和“精品化”同步发展；如何有效运用移动互联网推动微小说写作和阅读热情；如何建设微小说理论评论体系，将微小说纳入中国文学传统等根本性课题。与会作家和学者还就《小说选刊》“微小说”栏目的版面策略及优化手段；筹划“微型小说十年盘点”活动及其操作等具体项目积极建议献策。